

文史知识

谈谈我的治学经过

一代新声昆曲的由来

赵景深

李宗为

王仲荦

为什么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

肖黎等

从散曲的结构特色看怎样欣赏散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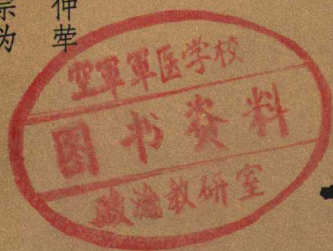
隋树森

李自成和张献忠

顾诚

慈禧听政为什么「垂帘」

朱家潘



1985

WENSHI ZHISHI



医药学院610 2 01495633

文史知识

1985年第9期

(总第51期)

• 治学之道 • 谈谈我的治学经过	王仲萃	3
• 文学史百题 • 一代新声昆曲的由来	赵景深 李宗为	10
• 历史百题 • “独尊儒术”是历史的必然	张烈	16
• 纪念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诞生 2130 周年 •		
为什么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		
△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	肖黎	21
△传统史学的优秀楷模	陈其泰	23
△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	杨燕起	26
理想、毅力与“名山”之业——重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杨牧之	29
诗 从散曲的结构特色看怎样欣赏散曲	隋树森	35
文 多情自古伤离别——柳永《雨霖铃》赏析	杨海明	40
欣 谈对晏殊词《踏莎行》“小径红稀”的理解	沈义芙	45
赏 妙在雅俗之间——说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	葛晓音	49
• 文史书目答问 • 吕天成和他的《曲品》	吴书荫	54
• 古典文学流派 • 宫体诗	商伟	58
文化 司马迁笔下的星汉世界	杜升云	60
史 瓦子究竟是什么场所	魏承思	65
知识 明宫养猫琐闻	杜婉言	70
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	李桂海	72
• 古文字学十二讲 •		
第十一讲 学习古文字学最低限度书目	李学勤	77

人物春秋	蔑视权贵的文学家温庭筠	刘扬忠	80
	李自成和张献忠	顾 诚	86
	清初名将鳌拜的一生	王思治	92

• 中国古代官制讲座(连载二十) •

兼夏商之职责 掩秦汉之文轨——唐代中原和边疆的地方官制(三)

杨志玖 张国刚 96

- 文史信息 • 明清之间中国史学思潮的变迁(85) 对神话“夸父逐日”的不同理解(102) 岳飞镇压杨么应该肯定(102) 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起源(103) 当前美英考古概况(103)

成语典故	冰 人	谷 雨	104
	铸成大错	肖 树	105

- 语言知识 • 《古代官职升降称谓浅释》补遗(上) 杨 忠 106

青年园地	如何理解孔子所说的“思无邪”	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	109
	真与善的统一即“思无邪”(刘向荣) “思无邪”也是孔子对音乐的要求(包亚明) 孔子文艺观有内在的弹性调节机制(王宏图) “思无邪”不是对《诗经》的评价,而是《诗经》产生的社会效果(翟宝海)		

- 文史信箱 • 慈禧听政为什么要“垂帘” 朱家溍 115

- 文史古迹 • 仙踪鬼迹话丰都 王家祐 李远国 117

- 书画欣赏 • 董源的《潇湘图卷》 张 蓓 122

- 文史研究动态 • 建国三十五年来《史记》研究综述 张大可 124

补白 4 则 仕数不遇(9) 金壶丹书(57)
下州郡求贤诏(114) 为盗之道(121)

《潇湘图卷》(封二) 丰都鬼城(封三)

谈谈我的治学经过

王 仲 苹



王仲苹，1913年生，浙江余姚人，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等。

我原籍是浙江余姚，但从小生长在上海，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大学。

我二十岁前，决定学文科了。当时听课之余，接触我国古典文学，也喜欢李商隐、温庭筠这一流派的诗。要学温李的诗，首先要多记典故，世人谓之獭祭鱼，高诱《吕氏春秋》注里说：“獭，水禽也，取鲤鱼置水边，四面陈之，世谓之祭鱼。”《谈苑》：“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我当时向山阴任董叔先生请教，他教导我先拣择一部使用典故多而卷数却又较少的集子，拿来加以注释，因此我就选中了《西昆酬唱集》。作《西昆酬唱集》的笺注，仅靠《佩文韵府》是不行的，我就一部部书地翻检诗句的出处，如《毛诗》、《左传》、《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麟台故事》、《初学记》、《太平御览》、《世说新语》、《穆天子传》、《西京杂记》、《酉阳杂俎》、《庄子》、《列子》、《楚辞》王逸注、《玉台新咏》、《樊南诗文集》冯浩注、《文选》李善注、《全唐诗》等。花了不到两年的功夫，一天天的翻检，终于基本作成了。当时翻检得很详细，不但解决了注释问题，也充实了自己，打好了基础，最后料检，仍有四、五条典故找不到娘家，隔了十多年，偶然在《山海经》郭

璞注里找到了。当然那时年纪轻、涉世浅，对集子中牵涉到的史实和作诗本意，都无法完全领会了解，如果当时急于出书，必然失之肤浅。所以这部《西昆酬唱集注》藏在箱底有数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卧病家居，开启旧篋，又把这部稿子拿出来，加以整理补充。1980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经过这一次的整理，自己觉得对杨亿、刘筠诸人的作诗本意，领会较深。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就印成书，到今天来翻阅，一定看出很多纰漏，现在错误的地方虽还难免，但究竟少得多了。我这里得到一条经验，年轻的同志，不要太急于出书，良工不示人以璞，一定要雕刻得很完整，才把东西拿出来，供人们批评指正。

我十八岁结婚，由于岳父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等关系，两家来往甚密，章夫人汤国梨先生知道我很喜欢古典文学，就把我的诗文介绍给太炎先生看，并把我推荐给章先生做学生。我本来是他学生的女婿——小门生一辈，现在我成了他的学生了。

我开始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和章先生自著的《国故论衡》、《文始》。并陪侍太炎先生去苏州和无锡讲学。当时有人非议他主张读经，我开始也以为读经无用，但听了几次章先生的讲学以后，我渐渐发觉章先生的主张读经，和当时保守势力的提倡读经，内容显有距离。第一，章先生继承了浙东学派“六经皆史”的说法，认为讲经学就是提倡史学；第二，认为经学也好，史学也好，多多研究，可以作借鉴；“保国性”，也就是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章先生的学问是双轨并进的。他有纯学术的著作，也有和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著作。从这一点看，也就懂得章先生为什么这样向往顾亭林，亭林既有《音学五书》这样纯学术性著作，但也有可供国家民族借鉴的象《日知录》这样的著作，双轨并进，是并行不悖的。

1936年夏，太炎先生逝世，我与沈延国整理并记录了章先生的遗著目录。

当初，我想编一部《两晋会要》和《南北朝会要》。后来听说泰兴朱铭盘先生已经编成，避免叠床架屋，我就辍笔不编这些了。因此编了一部《北周职官志》，在章先生健在时，我向他汇报过这一工作，他点

点头，指示了两点，一，必须对孙诒让氏的《周礼正义》，细致地研读；二，必须广泛参考金石墓志。我听了他的话，后来在1948年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翻阅所藏的金石拓片，后来又翻阅了赵万里氏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都是根据他生前指示来做的。

《北周职官志》后来将西魏北周两朝的典章制度穿插补充进去，就改名为《北周六典》。

写《北周六典》，不仅要搜集有关北周的资料，因为北周是仿《周礼》六官的，《周礼》的研究，幸亏有一部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但是《周礼》以外，《左传》、《国语》等著作，有关周官部分，都得搜集。除了周官以外，北周还采用汉魏官制很多，还得找出它的娘家来，看看四十万字一部小书，触及面非常广，这就不得不投入很多的劳动进去了。

1935年，又起草了一部《北周地理志》，这是与《北周职官志》密切相关的姊妹作。

《北周地理志》写作时，困难更多，当然我主要依靠的是《魏书·地形志》和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但是魏收写《魏书》时，是根据东魏的版图来写的，关西的郡县，只据孝武帝永熙旧籍，西魏添置的郡县，一概不录，资料残缺太多了。《隋书·地理志》本名《五代史志》，但对梁、陈、周、齐的州郡废置，还是非常简略。《魏书·地形志》里记载的北方州郡县，在《隋书·地理志》中消失不见了，在什么时间废掉的呢？无材料作依据来加以说明，我还是采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一个郡一个郡地解决，一个县一个县地解决，郡县次第解决，州也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都是我二十多岁时候着手搞的，这两部稿子开始编写的时候，是极不成熟的，我记得抗日战争开始，《制言》在上海复刊，向我征稿，不交吧，压力很大。便从《北周地理志》材料中加以提炼，稍加组织，写成了一篇《北周总管府隶州考》，结果受到的挑剔多于赞誉。但这对我却是一种推动力，也就要求我把这两部书进一步的充实。我有一个特点，每处逆境，遇到不称心的时候，我的要诀，就是“沉下心来”。和著作接近一点，和外面疏远一

点，心就平静下来了，写作也就推进进一步了。《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这两部姊妹作，从初起稿到写定，前后的距离也有四十多年。

建国前，我曾先后辗转于上海、江浙、昆明、重庆、南京、青岛等地，如在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担任过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我有一个不旧不新的箱子，里面装些替换的衣服，另外就是上面说的《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三部书稿，它们跟我真是走遍了天涯海角。

建国后，我从1952年起，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担任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课程，由于我一口南方音，北方同学听课感到困难，于是开始编写一部讲义，来补救这方面的缺憾；但不尽符合教材要求。以后就索性放开手花了五、六年时间，写成《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这部断代史。

“上册”于1961年7月出版；1966年6月以后，就成为“放毒”的史书，它的寿命只有五岁就夭折了，我当时很泄气。我把宝贵的青春和精力白白浪费了，真是感慨万端，决心不再搞它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我把这部稿子，放在木箱底，从没有去触动它。由于没有触动，所以推崇武周女皇的议论，儒法斗争等等奇谈怪说，没有倾注到我的著作里来。

“四人帮”粉碎后，1976年冬，上海人民出版社即来信表示要重印我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并且出版《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下册），我觉得很为难。因为这部书是在1952年着手编写的，在这二十五年之间，历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争论甚烈，进展甚快，我不能把二十五年前着手编写的旧作，原封不动地重新印出来，因而势必要大加修订。我征得同意后，决意抽出两三年的时间，重新写定。并把原书改写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书。1979年5月，我写定了《魏晋南北朝史》交给出版社，这年12月，书就印成出版了。《隋唐五代史》也费了三年半时间，在1983年7月写定交给了出版社。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写作宗旨，我已在两书的《序言》里，详细加以说明了，这里只讲两个问题。

中国的古史，如《尚书》除《禹贡》篇外，大多是政治史，《左传》前人名为“相斫书”，当然近乎一种诬蔑，但它专讲政治和战争经过，却是实情。司马迁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他写了很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的传记，并且写得栩栩如生。此外，他的八书都是和经济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除了文化、经济以外，还介绍了当时的风尚习俗。班固的《汉书》，《食货志》重经济；《地理志》重地理沿革，也牵涉州郡物产；《艺文志》记录了文化的积累；《儒林传》着重学术的传授；《货殖传》、《游侠传》也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班、马的优点，都是全面介绍当时社会。不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全面介绍，这样才能看到祖国的伟大。我们今天写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我认为应该继承我国史书的优良传统，全面地介绍出伟大祖国的风貌，不但要把政治史、经济史讲清楚，也要把祖国优秀的文化介绍出来。

在建国前，有人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看作是中国史上的黑暗时代，认为它一团漆黑，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我本人也曾受到过这个看法的影响。后来我这个看法改变了。诚然，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货币近于废弃，这是由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而造成的，但不等于说这个社会的进展就裹足不前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就不再向前发展了。相反，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经学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史学著作、地理学著作，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杂技等等，以及科学技术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拙著《魏晋南北朝史》，文化部分的字数几占全书文字的四分之一；《隋唐五代史》共一百二十万字，文化部分，几达五十万字。重点写经济部分，强调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尤其强调文化的发展，借此来冲淡政治、军事方面黑暗面的影响，我想是有此必要的。当然由于我的水平所限，文化部分内容不但还有疏漏的地方，而且大半借用了前人和近代学人研究的成果来作一般性叙述，写来也浮光掠影，不够深入，这是应该深自谴责的。

其次，是内容的净化问题，过去对这方面注意不够，造成不良影

响。这次改写，凡是太恐怖，太野蛮的行为，如隋末的朱粲，如唐末的秦宗权、孙儒这一类人的暴行一概不写。有关黄色的故事，如隋炀帝戏陈夫人等事，也接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意见，不再提及了。

1962年，国务院调我去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山东大学主持标点南朝五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当时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主持北朝史点校工作，南朝由我负责，中华书局内部开玩笑，称为“南王北唐”。实际唐长孺教授的学问胜我百倍。

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参加点校的有张维华教授、卢振华教授和我。我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已出版，对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职官地理，比较熟悉，所以我被指定点校有“志”的《宋书》和《南齐书》。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校了宋本、三朝递修本、南监本、北监本等，还采用了张森楷、张元济等人的校记，又增加了用《册府元龟》来参校，尽管标点上还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校勘的质量却是较有保证的。

第一次点校工作，从1962年冬开始，到1966年结束，我点校的《南齐书》和张维华教授点校的《陈书》都已经定稿，《梁书》也快结束，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被学校电召回校了。

第二次点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和我们联系，当时我和张维华教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不准前去，只准卢振华教授一人前往，不到几个月，卢振华也回来了。

第三次点校工作，从1971年7月开始，到1976年。卢振华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个人前去。我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商量，把《南史》点校工作委托卢振华教授在济南进行，由我在北京定稿。我点校《宋书》的工作，则在北京进行，到1975年，《宋书》点校工作基本完成，1976年，《南史》的点校也基本定稿。3月末，我因病住进同仁医院(当时改名工农兵医院)，4月5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人民悼念周总理的运动，人心之激动，场面之壮阔，

感人至深。我病卧在医院里，那么想，有这么多好样的人民，中国的政治局面是不会坏下去的，中国是不会亡的。住院近两月，出院后，又在中华书局两月，我负责的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也就回济南了。

回顾几十年的经历，我每当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总想沉下心来，整理旧著。1968年以后，我病卧中，开始把《北周地理志》加以整理，到了1971年，总算写定完稿了。这部书的写定，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北周六典》也接着写定了。最后，《西昆酬唱集注》也在北京写定了。不久，“四人帮”倒台，天日重见，我就把这三部稿子交付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接受后，很快把我这三部书陆续印刷了出来。这三部书都是我二十几岁时起草搞的，到六十多岁，才见成书，稿藏四十多载，没有被蠹虫蛀掉，没有被作为“四旧”烧掉，也总算万幸了。

有朋友问我：“你以后还准备写哪些书？”我告诉他，我准备把这些年的论文编成一个集子，集名《鹊华山馆丛稿》，计划一年之内编成。此后视我的健康情况，还预备写几部书。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仕 数 不 遇

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途者。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

——《论衡·逢遇》

【译文】周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多次求官都未成功，鬓发斑白，在路上哭泣。有人问他：“您为什么哭泣呢？”他回答说：“我多次谋官不成，为年老失去机会感到伤心。因此而哭。”那人问：“您为什么一直没有成功呢？”他回答说：“我年轻时学文，文才具备，便想谋官，不料君王却喜欢任用老年人。这个喜欢用老人的君王死后，继任的君王喜欢任用武士。我改学武，武艺刚学好，尚武的君王又死了。新的年轻的君王现在刚即位，可他又好用年轻人，而我却已衰老，所以终生不曾遇到一次被赏识的机会。”

（卜 平）

一代新声昆曲的由来

赵景深 李宗为

1 “昆曲”的名称是清代人叫出来的，原来的名称是“昆山腔”，或简称“昆腔”。它本是南曲戏文（简称“南戏”或“戏文”）的声腔之一，所以要讲到昆曲的来源就得从南戏谈起。

早在北宋末叶的宣和年间（1119—1125），由于江南东南沿海一带社会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农村的生活也相对比较富裕，因而在浙江温州一带产生了一种民间歌舞小戏，这就是在南宋被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的南戏的萌芽。

宋室南渡之后，与温州邻近的临安（杭州）成了整个南方的政治中心，经济与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加之北方艺人大量流入，于是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也随之兴旺发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源于相邻地区的南戏获得了合适的土壤，也迅速繁荣起来。到绍熙年间（1190—1194），在南戏中已经出现了《赵贞女》、《王魁》这样艺术性较高的剧本，标志着它已经进入较成熟的阶段。元代，在北方杂剧盛行的同时，南戏仍然继续不断地在民间流行、发展着。它演出的区域也不断扩大，甚至远及杂剧的演出中心——大都。宋元南戏的剧目，至今可考的还有一百几十种，可见当时的盛况。

可是，南戏是在南方民间歌舞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和主要源于诸宫调的北曲属于两个不同的音乐系统。所以它没有宫调之分，曲调的主要来源是各种民歌以及词体歌曲。并且它所用的音阶也是我国原来的五声音阶，与北曲从隋唐燕乐那儿继承下来的七声音阶不同。正因为如此，在当时一般士大夫们看起来，只有杂剧是“正声雅乐”，而对于南戏则认为鄙野陋俗而不屑一顾。故徐渭《南词叙录》说“永嘉

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啁农士女顺口可歌而已”，因而“士夫罕有留意者”。

到元代末年，南戏经过长久的发展，影响益大，终于渐渐引起了上层社会的文人们的注意。高则诚以南戏形式创作《琵琶记》，“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南词叙录》）。与其相先后，相传出于施惠的《拜月亭记》也以巨大的艺术成就震撼剧坛。这些优秀南戏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南戏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发展，已即将扶摇而上、进入一个突飞猛进的新时期。

2 随着南戏在江南一带的流行，它原来所用的温州地方腔调，在各地结合当地的语音和曲调，渐渐形成了多种多样、

各呈异采的声腔。在元末，与高则诚同时，昆山的顾坚、杨维桢等精通音乐词曲的文人集团，将当时流行在昆山一带、与昆山的语音和歌曲相结合的南戏唱腔加以改进，形成了一种在明初被称为“昆山腔”的新声腔。魏良辅《南词引正》对此记叙道：

元朝有顾坚者，虽（此字疑涉下文而衍）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扩廓怛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之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其中提到的“杨铁笛”就是杨维桢（字廉夫），他不仅工诗能文，擅长乐府，还吹得一手好铁笛，因此自号“铁笛道人”。另一个顾阿瑛是当时江南著名的大地主，据方志记载，“其家园地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饴馆声伎，并冠绝一时”（乾隆修《昆山阳新合志》卷二四）。他本人也善弹古阮，醉心南曲，家有歌妓“翡翠秀”、“天香秀”等十数辈。这一嗜尚词曲、兼通音乐的文人集团对昆山腔的改造，看来主要是在艺术趣味方面的，这对昆山腔艺术情趣的形成及其后来的兴起无疑具有一定影响。

由于顾坚等人的倡导和改造，至明初昆山腔声誉雀起，甚至引起了喜爱南曲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注意。明·周玄玮《泾林续记》记载朱元璋召见昆山老人周寿谊时特地问他：“闻昆山腔甚嘉，尔亦能讴否？”然而在明初，北曲杂剧仍在全国范围占有支配地位，南戏仍然是主流

行于江南一隅的地方戏，故作为南戏声腔之一的昆山腔也因而受到限制，未能立即蔚为大国。

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南戏进一步吸收了北曲杂剧的一些格律和曲调，形成了一种名叫“传奇”的新体裁，终于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与此同时，昆山腔也随着脱颖而出，逐渐成为南戏诸声腔中最主要的四大声腔之一。故主要生活在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祝允明，在《猥谈》中说：“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愚人蠢工徇意更变，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以有宫调的杂剧为“正声”的祝允明是看不起兴起于民间的南戏的，所以在述及南戏的兴盛时鄙夷之意形诸词表，致称创造和改良南戏诸腔的人为“愚人蠢工”。不过从他的这一贬抑之辞中也可以看出，昆山腔虽然以顾坚等人而著称，但是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贡献最大的还是诸多默默无闻的民间艺人。

3 昆山腔虽然在明弘治、正德年间已经与余姚、海盐、弋阳等腔并列为南戏的四大声腔，但是从时人的记载来看，在四大声腔中它还只能忝陪末座，南戏中首先在全国范围流行并渐渐压倒北杂剧的是海盐、弋阳等腔，而昆山腔则无与焉。

昆山腔最终之蔚为大国，与魏良辅对它的进一步改革是分不开的。关于魏良辅的身世，是一个诸说纷纭的问题。张大复说：“魏良辅，别号尚泉，居太仓之南关，能谐声律，转音若丝。”(《梅花草堂笔谈·昆腔》)沈宠绥进一步说：“嘉、隆间有豫章魏良辅者，流寓娄东鹿城之间。”(《度曲须知》卷上“曲运隆衰”条)近来蒋星煜同志更进一步在清康熙于成龙纂修本《江西通志》的《选举志》及乾隆时修的《南昌府志》卷五十二中查到了一个叫魏良辅的。他是魏桀的儿子，字师召，嘉靖五年(1526)成进士，官至山东左布政使。据这一魏良辅的籍贯、年代及其家乡流传的关于他善唱戏曲的轶事，蒋星煜同志断定他就是那个后来流寓太仓的魏良辅。

这个“生而审音”的士大夫，由于我们所不能确知的难言之隐而流落他乡，恰恰居住在当时号为“南关莫开口”的以善歌著称的太仓南

关。自然会复燃起对歌曲的热情。他的改革是在他工于北曲，而又虚心向当时昆腔名家请教、与同志者切磋的基础上施行的。张大复说：“良辅自谓勿如户侯过方适，每有得必往咨焉。过称善乃行，不即反复数交勿厌。”（《梅花草堂笔谈》）明末清初的余怀也说：“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缕心南曲，足迹不下楼十年。……合曲必用箫管，而吴人则有张梅谷，善吹洞箫，以箫从曲；毗陵人则有谢林泉，工撮(yē)管，以管从曲，皆与良辅游。”（《虞初新志·寄畅园闻歌记》）正因为他具有深厚的北曲基础，又能虚心地向昆腔前辈学习，并坚持与乐师合作，所以能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在昆腔的改革上取得极大的成就，成为一代宗匠。

魏良辅改革昆腔的情形和所取得的成就，在余怀《寄畅园闻歌记》和沈宠绥《度曲须知》中有所介绍。余怀说：

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声：疾徐高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取字齿唇间，跌换巧捩，恒以深邃助其凄婉。吴中老曲师如袁髯，尤耽者，皆瞠乎自以为不及也。
沈宠绥说：

（魏良辅）生而审音，愤南曲之讹陋也，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所度之曲，则皆“折梅逢使”、“昨夜春归”诸名笔；采之传奇，则有“拜星月”、“花阴夜静”等词；要皆别有唱法，绝非戏场声口。腔曰昆腔，曲名时曲，声场稟为曲圣，后世依为鼻祖。

从以上记叙中可以看出，魏良辅主要是通过为南戏中诸名作的曲子改谱新的曲调来进行改革的，如引文中所谓“拜星月”就是《拜月亭记·拜月》一出的〔二郎神〕一曲。在谱新曲时，他把节奏放慢，并且使声音的变化更加细腻曲折，这就是所谓“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同时又使歌声的抑扬顿挫符合歌辞中每个字的声调和所用宫调的规定，这就是所谓“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疾徐高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此外，他又发展了我国民族声乐传统中语言与歌唱并重的美学思想，在歌唱时特别强调咬字吐音的技巧，使每个字都能准确地收声归韵、字

音清晰。通过新曲的谱写和一系列唱曲理论的总结，魏良辅建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因而称为“水磨调”的新昆腔歌唱体系，使昆腔的音乐性和歌唱艺术有了极大的提高，并进一步适合士大夫们的喜尚。经他改革的昆腔新声在当时风靡吴中，被称为“时曲”；他所总结出来的唱曲理论更为后世奉为圭臬。所以后来从事昆曲的都把魏良辅奉为曲圣，视为昆曲的不祧之祖。这一昆腔新声，才基本上成为现在所歌唱的昆曲的样子。

4 经魏良辅改革后创建的新腔不久就不胫而走，深受听众特别是士大夫们的喜爱，但它在当时仅用于清唱，而不用用于演剧，故魏良辅《曲律》只标举清唱，说：“清唱，俗语谓之‘冷板凳’，不比戏场借锣鼓之势，全要闲雅整肃、清俊温润。”这对于它迅速地广泛流传自然颇有限制。所以徐渭在其著成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南词叙录》中，一方面已说到昆腔“流丽悠远，出乎三腔(指海盐、余姚、弋阳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一方面也指出它“止行于吴中”。使昆腔新声用于演剧，在艺术上进一步完善，并促使其影响迅速扩大的是魏良辅的后学梁辰鱼。

梁辰鱼，字伯龙，号少白，昆山人。他出身于小官僚家庭，喜交游，好任侠而不求功名，在当时颇有令誉，“以布衣肮脏颀颀贤公卿间”(《陈迦陵文集·赠蔡孟昭序》)。他继承了魏良辅的新腔和唱曲理论，又通过实践不断揣摩，达到“转喉发音，声出金石”，“为一时词家所宗”的境地。然而，除对昆曲的声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外，他对昆曲发展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还是他“考订元剧，自翻新调”(《梅花草堂笔谈》)创作了第一部专门供昆曲新腔演出的传奇《浣纱记》，将昆腔从士大夫的小庭深院推向了更加面向大众的戏剧舞台。《浣纱记》不仅以新曲唱新辞，使人耳目一新，并且在格律、文字和思想艺术性上也颇有独到之处，因此一经问世，立即为人争相传唱。与梁辰鱼同时的王世贞有诗说：“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可见其受人欢迎的情况。《浣纱记》的成功进一步提高了昆腔新声的声誉，并且树立了以昆腔新声创作传奇的榜样。在它的号召下文人学者纷纷起而效之，争相撰写昆腔传奇，形成一个传奇的创作热潮。一时作者云蒸，佳作

霞蔚；其中产生了汤显祖《玉茗堂四梦》（包括《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等四本传奇）等卓越之作。昆腔的影响突飞猛进，迅速地在南戏诸腔中由末席而一跃居于首位而风行全国。作于万历年间的王骥德《曲律》说：“旧凡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至万历末年，昆腔又传入北京，并迅速取代了继北曲后流行于此的弋阳腔。从此，昆腔成为全国性的最主要的剧种，被称为“官腔”。经过无数代民间艺人的努力和富有革新精神的士大夫们的改革，一种在艺术成就上堪称史无前例的戏曲——昆曲，终于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境界。

最后，我们来谈谈“昆曲”这一名称的产生和流行。

5

昆腔既已以浩大的声势风行于全国，压倒了南戏其他诸腔，自然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南曲的正宗，特别是独尊昆腔的士大夫们，不再乐意将昆腔仅作为南戏的声腔之一而与其他诸腔并列，因而渐有人径以“南曲”名之。如《寄畅园闻歌记》中余怀就直接说“南曲盖始于昆山魏良辅云”，明显地以“南曲”来专指昆山腔。明末清初的昆腔清唱家苏昆生也被陈维崧誉为“南曲当今第一”（《迦陵词全集·赠苏昆生》）。然而这一称呼毕竟太笼统了，因而在清代乾隆以后这一名称又渐渐被“昆曲”之称取代，如同样称道苏昆生，严长明《秦云擷英小谱》就说是：“自有昆曲二百余年，推苏昆生发口即中声，毕生所歌，皆正宫调。”“昆曲”之称的运用日益普遍，近代以来，成为使用得最普遍的名称。这一名称的历久不废与昆腔的清唱活动有关。在以昆腔演传奇的形式盛行的同时，得魏良辅嫡传的昆腔清唱活动并未消歇，而是同样兴盛地流行着。这一清唱活动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所唱又不尽为剧曲，也有散曲，因此与演出活动分庭抗礼，并行不衰。这在各剧种中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龚自珍对此说得很分明：“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为清曲，一曰剧曲。清曲为雅宴，剧曲为狎游，至严不相犯。”这样，对于昆腔的整个演唱活动就难于以“昆戏”或“昆剧”来包括。于是“昆曲”就成为昆腔的演出活动和清唱活动以及昆腔的剧曲和散曲的统称而流行起来了。

“独尊儒术” 是历史的必然

张 烈

秦始皇焚书（公元前213）坑儒（公元前212），对儒家思想作了简单粗暴的否定。事隔七十二、三年，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公元前140），历史地否定了秦始皇的思想文化政策。这对儒家思想说来，则是否定之否定。我们从这种表面上似乎截然对立的历史事件中，可以观察其间社会政治的重大变化和独尊儒术的历史意义。

历史的必然

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义，法家韩非说：“仁义用于古而不用於今”，“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在韩非看来，仁义已是过时之物，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现实问题。秦始皇实践了韩非的学说，使用暴力逐步

消灭山东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统一，结束了长期的战争动乱局面，给社会带来了和平，给劳动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这种暴力实现的统一，深得人心，黎民百姓“莫不虚心而仰上”（贾谊《过秦论》）。然而，秦始皇在实现统一后并未改变暴力方针，甚至使用焚书坑儒的手段来强化这种方针。表现在治国问题上也就实行暴力统治政策，严刑酷罚，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时，全国人口不过二千万左右，其中北筑长城者达三十万（《史记·蒙恬列传》、《淮南子·人间训》说达五十万。），南戍五岭者达五十余万（《通考·兵考一》），修建骊山墓和阿房宫的刑徒竟有七十余万之多（《史记·秦始皇本纪》），全国服役服刑的人数当在二百万以上，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强，而且这些人又多为精壮劳力。广大农民得不到安宁和休息，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因而，暴力便由进步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农民所反对的目标。公元前209年陈涉、吴广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的社会背景下爆发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这不仅标志暴力统治政策的破产，也意味着法家暴力统治思想的破产。

秦始皇的排儒政策，驱使众多儒生参加了农民起义。在刘邦队伍里就有不少儒生，有的还立了大功。如儒生酈食其(yìjī)为刘邦说降了齐王田广(后因韩信攻齐才使酈生遭烹)；儒生